

17~20 世纪初暹罗华人社会的形成

庞卫东¹ 李庆丰²

(1、厦门大学 南洋研究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2、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系, 河南 郑州 450016)

[摘 要] 自 17 世纪开始, 以商人为主的中国人移居暹罗者日渐增多。从吞武里王朝到曼谷王朝初期, 暹罗华人社会出现了新的变化, 潮州人成为暹罗华人社会的主角。20 世纪初, 随着暹罗社会新因素的出现, 华社也呈现出了新的特点。此时, 真正意义上的暹罗华人社会形成。

[关键词] 暹罗; 华人社会; 移民

[中图分类号] D634.3.3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925(2008)01-0021-06

就目前学术界而言, 对暹罗华侨华人的研究成果比较多, 涉及的内容也很广泛。但就暹罗华侨华人社会的形成过程及其每个阶段的特点等问题, 研究不够。因此, 本文拟对 17 世纪到 20 世纪初暹罗华人社会的形成过程做简单的探讨。

一、17 世纪到大城王朝结束时的中国移民

自宋元以来, 华人流寓暹罗者, 代有增加。至明后期, 定居暹罗的华人已不在少数。嘉靖十五年(1536)成书的《海语》载: 在暹罗国都大城, “虽王之妻妾, 皆盛饰倚市, 与汉儿相贸易, 不诟亦不敢乱……有奶街, 为华人流寓者之居。”^[1]可见至少在 16 世纪暹罗已有不少商贸移民, 并且出现了华

人定居区。

17 世纪时, 华人大多集中于暹罗湾及南部的各港口。施坚雅认为, 17 世纪初, 暹罗首都阿瑜陀耶(即大城)和北榄波、万佛岁、北柳、柴真、万岑、那坤是贪玛叻(六坤)、北大年、普吉岛、尖竹汶、曼谷、佛丕、猜耶、廊营、董里等地都有中国的商民贸易侨居^[2]。北大年当时是暹罗的属国, 又称大泥。明代张燮于万历四十六年(1627)成书的《东西洋考》记述了当时北大年的商业情况, “华人流寓者甚多, 趾相踵也。舶至, 献果币如他国, 初亦设食待我, 彼来此礼渐废矣。货卖彼国, 不敢征税”^[3]。“初漳人张某为哪督, 哪督者, 大酋之号也。”^[4]由此可见, 当时华人来暹者渐多, 暹人与华人相处, 已习以为常。同时, 华人之中也出现了“拿督”之类的首领。据史金纳估计, 至 17 世纪后期, 暹罗华

[收稿日期] 2007-11-28

[作者简介] 庞卫东(1979-), 男, 河南兰考人,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 06 级博士研究生; 李庆丰(1975-), 男, 河南安阳人,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系助教, 历史学硕士。

“奶街”并非是一条名叫“奶”的街, “奶街”是泰语 NAIGAI 的汉译。汉字“街”古读 GAI, 现广东话仍读 GAI。“奶街”原是一条小河的名称, 后为华人的集居地。现译为“乃该”。

人至少有一万人，其中首都阿瑜陀耶的华人大约占一半^[9]。而华人的主体则是大大小小的商人，这主要是由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所促成的：

1、由于受‘萨卡迪纳’制的束缚及传统佛教思想的影响，泰人一般比较喜欢农业、政府公职和独立经营的职业。而暹罗的华人大多来自素有冒险、航海和经商传统的广东和福建两省，他们到暹罗是想尽快赚到一笔钱回中国，而非在海外定居。因此，他们趋向于从事报酬最好、产生利润最快的行业，所以他们一般选择商业而非农业。

2、由于暹中贸易的利润丰厚，加之华人具有经济、文化、技术和市场等方面的综合优势，使得暹罗华人很快适应了颂昙王时期建立的王室贸易垄断制度，并取得了王室的信任，成为王室贸易的代理人。

3、大城是当时东西方国际贸易和帆船航线上一个重要集散中心，爪哇、马来半岛运来的货物先集中在这里，然后再转运到中国和日本；而中国和日本货物也是先转运到大城，然后再分散转运各国。由于日本侨民与暹罗当政者失和，致使其在1632年被逐出暹罗。1636年，日本开始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仅允许中国及荷兰的商船抵日，结果暹日之间的贸易几乎全部落入华人之手。

4、英国人、法国人、荷兰人虽早在17世纪初便开始在暹罗开设商站，但真正能对华人产生威胁的也仅是荷兰人。荷兰在1664年8月用武力强迫暹罗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其中一条规定：“从今以后不论国王陛下及其各级臣民的船只（包括帆船、机船和小船）都不得雇用中国人……应大大减少鼓励这一民族的人入境：凡被我方在海上发现雇有中国人的大小船只，都将被作为战利品没收，公司永远不负赔偿责任。”^[10]但这个规定认真执行起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王室很难招募到有经验的暹罗船工。1688年爆发的反西方革命使英法在暹罗的贸易中断了100多年。荷兰在1705年也陷入了严重的危机，此后荷兰对暹罗的贸易也是时断时续。华人则乘机接手了他们在暹罗的所有贸易份额。

17世纪，大城华人社会的成员，除了商人以外，还有士大夫、医师、工匠、戏剧艺人和养猪人。华南农民几乎都把蔬菜种植和养猪业结合起来经营，因此可能也有蔬菜种植人。一直到大城王朝末期，暹罗首都华人的地位是很优越的。大城的华人

既住城内又住城外，城中的华人区位于该城的东南角，在华人区有一条繁华的大街通往皇宫，该街两边是商人和工匠的店铺。城外的华人区位于南面和东面的运河和河道对岸。华人有自己选出的首领甲必丹，并被授予暹罗官衔，在暹罗负责外交和商务的官员领导下管理全暹罗华人的一切事务^[11]。

阿瑜陀耶王朝时代，华人之所以移民暹罗，之所以在暹罗境内的分布较广，之所以能成为暹罗远航帆船制造者、驾驶者和暹罗对外贸易的实际主持人，这些都是与暹罗欢迎和厚待华人分不开的。阿瑜陀耶王朝《律法》的十三条规定：“不准西方人和印度人与暹罗妇女结婚，因为这些外国人与暹罗妇女所生的子女会向外国泄露国家机密，对国家安全造成危害。华人则不受限制，可以和暹罗妇女自由通婚，可以在暹罗境内自由旅行、自由活动。”^[12]可见阿瑜陀耶王朝从来没有把华人当作外人，而是看作可信赖的自己人。陈伦炯于雍正八年（1730年）写成的《海国闻见录》也说：暹罗“尊敬中国，用汉人为官属，理国政，掌财赋。”^[13]

二、从吞武里王朝到19世纪末华人社区的变迁

18世纪中叶，大城的华人人数比前代有所增加。1759年缅甸军队向暹罗发动侵略，“缅军推至大城，缅太子所领前锋，扎营波三顿区，时华人税官銮亚派披博真奉请以二千华人为志愿军出战，皇许之。”^[14]1766年暹罗首都被缅人包围时，有6000名中国人被指派去防守城东南的荷兰商馆区^[15]。由此可见，当时大城的华人已经相当多。

从吞武里王朝开始，暹罗华人社区出现了几点显著的变化：

（一）粤东潮州籍来暹人数超过闽籍人

1767年，大城王朝被缅人灭亡后，潮州华人郑信（又名郑昭）在暹罗湾东岸的罗勇招兵买马，重振旗鼓，号召人民奋起抵抗侵略者。郑信乘缅甸班师回朝的机会，几经恶战，光复了陷落不到半年的京城。1767年冬，年仅33岁的郑信被部下拥戴为王，建都吞武里，史称吞武里王朝。在光复暹罗的战争中，郑信得到大批华人的全力支持。在建立吞武里王朝以后，郑信为彰表华人在战争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册封华人首领披耶拉差悉蒂为侯爵，同

时赐给他及他的部属吞武里东面一块地(今曼谷大皇宫所在地)为其居住和生息的地方。原住在故都大城的华人纷纷迁移到曼谷。同时也出于建设新都、恢复经济的需要,郑信公开招徕中国人移居暹罗。大批闽、粤移民尤其是其故乡的潮州人和已经流居越南、柬埔寨的潮州人,纷纷涌来曼谷,于是在曼谷空翁河和昭披耶河河岸出现了多处新的华人居民点。从此,潮州人越来越多,终于超过了闽籍华人而居全泰首位。在郑信建立吞武里王朝后,最先访问暹罗的欧洲人之约翰·克劳福(John Craford)写道:“达信的同乡是在他大力鼓励下,才这么大批地被吸引到暹罗来定居的。华人口口的这一异常扩张,几乎可以说是泰国数百年中所发生的唯一重大变化。”^[12]

(二)曼谷的华人商业城开始形成

1782年,曼谷王朝(却克里王朝)建立后,拉玛一世把国都迁到吞武里对岸的曼谷。原华人功臣披耶拉差悉蒂及其部下的驻地被划为皇宫及政府机关所在地,并谕令华人迁到城南三本佛寺至三聘佛寺一带居住,此即三聘唐人街形成之始。该区地处昭披耶河岸,海外交通便捷,又有支流辐射各地,便于与内地联系。“川走中暹之间的帆船多半到此地停泊,双方贸易便在该处进行,遂造成三聘港地区一个有利的繁荣发展机会。在那个时期,中国帆船来暹罗采购的主要商品是大米,因此该处又成为京畿大米交易的集散地。”^[13]

三聘街全长大约两公里,可分为三聘米街和三聘米尾街两段。从三聘城门外起,经曲仔桥进入三聘直街、越三饭街,接着便是三聘竹耄蔑街、蚊帐街、打锡街、咸鱼街、米街、米街尾。三聘米街尾的终点是越阁,但米街尾在终点的地方又与后来新建的嵩越路衔接。因此,嵩越路实际上是三聘街的延伸,嵩越路兴起后,暹罗华人进出口商多集中于该路。三聘街及其延伸的嵩越路,一直是泰国的商贸中心,那时候曼谷销到内地的货物,多以三聘街为集散地,内地输往国外的土产,多由嵩越路的华商组运出口。

随着曼谷的中国移民逐步增加,以三聘唐人街为中心的中国商业城的范围也逐步扩大。1861年,拉玛四世(1851~1868)下谕修筑石龙军路。该路全长10公里,为曼谷有名的古道之一。石龙军

路建成后,很快又成为华人聚居的商业街,尤其是石龙军路的越迪路段华人更为集中。介于石龙军路和三聘街之间的耀华力路,为拉玛五世(1868~1910年)下谕修建。该路长1430米,宽20米,比石龙军的路面和三聘的街面都要广阔得多,为耀华力路日后成为曼谷中国城最繁华的闹市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样,到了19世纪末期,以“一街三路”(三聘街、嵩越路、石龙军路、耀华力路)为格局的曼谷中国商业城便宣告形成^[14]。

(三)华人定居点的扩展

19世纪初,暹罗的华人几乎全部定居于暹罗湾地区的港口以及主要河流的下游一带的城镇。“实际上自东南端哒叻至南端柿武里沿暹罗湾一带的每一个城市,都有中国人的定居地。在挽巴功河流域的,暹罗的中国人定居地远及巴真武里;在昭披耶河与他真河流域的,远及北榄坡……但在泰国北榄坡以北或以东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现可以说明早在拉玛一世统治时期中国人就长期定居于内地地区的遗迹或当地文献。”^[15]

1855年签订鲍林条约后,暹罗被迫向西方国家开放门户,暹罗被纳入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1873年,朱拉隆功即位,逐步进行各种改革,废除奴隶制、兴修水利和交通设施,大力发展经济,继续采用欢迎、厚待、重用华人的政策。此时,中国社会在鸦片战争后正面临历史上空前之变局,一方面是清廷乾隆以来人口高速增长的压力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的入侵使社会矛盾更加尖锐。这两者的结合促使大批华人来到了暹罗。

随着华人移民的大量涌入,华人定居点开始由南向北、由港口向内地、由城镇向农村扩展。华人由于受到祖居地风俗及职业习惯的影响,在定居区扩展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定的特点。福建人几乎不迁离大的贸易城市,因为他们几乎全部是商人和海员。潮州人则主要定居于城镇的周围,发展种植园业,为城镇提供果蔬产品。由于在技术和机械方面的优势,广东人一般喜欢在城市中作工匠。“事实上,真正开拓暹罗内地的并不是潮州人,也不是福建人或广东人,而是海南人……那些来自海南岛的人,主要是小贩和渔民……他们的贫困及卑微的社会地位,使他们很难在城市中心地区

哒叻(Trat),当时称为桐炎(Thungyai)

与福建人以及广东人竞争。另一方面,海南人所具有的捕鱼造船特长把他们引向河流,他们在锯木上的专长又把他们引向北部的柚木林区。由于对热带疾病的先天抵抗力,在那些潮州人一去就大量死亡的地区,海南人却能进去。^[116]

在19世纪晚期,随着铁路系统在暹罗北部的扩展,一批铁路沿线的城市迅速兴起。城镇的发展吸引了大批潮州商人、广东和客家的工匠来这里定居谋生。“当潮州人和其他语系集团的中国人在沿铁路线的较大市镇定居下来的时候,海南人也出现了一种倾向,陆续向这一地区内小地方发展或移入处女地。正如披集一位熟悉情况的老人所说:‘总的来说海南人是最早来到内地的。然而,当潮州人来到后,他们胜过了海南人,因为他们愿意在盈利限度极小的条件下经营商业。因此海南人就移到更偏僻的地方去。’……20世纪初,海南人继续向清莱府、难府、黎府以及猜耶奔等府更荒野的虐疾地区推进。”^[117]

(四) 华人职业的专门化和社会阶层的分化

大城王朝时期,进入暹罗的移民以商人和技术劳动力为主,人数较少。从郑信即位的1767年到拉玛五世去世的1910年间,暹罗一直执行对华人的友好、厚待的政策,吸引了众多以破产农民为主体的华人源源不断地涌入暹罗。随着华人的大量到来,华人的职业构成和社会阶层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首先,职业多元化。

采矿业。虽然,早在13~14世纪中外史籍中已有中国人在暹罗南部开采锡矿的记载,但大规模开矿的时期却是在19世纪以后。1821年,福建人吴福星、吴万利父子到北大年开采锡矿,继而创办“金利号”商行。其后,吴万利任北大年海关监督时,华人纷纷来投。暹罗开锡矿华人有成就者,首推许泗漳。许氏只身来到槟城,初当苦工,稍有积蓄后于1822年到暹罗攀牙经商,来往于槟城与泰南之间。1845年受封为拉廊王后,招华工前来开采锡矿。许氏三代为暹罗锡矿开采和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华人受他们的吸引,纷纷前来,1824年泰南有华人5000人,50年代则达四万人^[118]。

机器碾米业是19世纪后期华人发展的一个重要行业。在鲍林条约之前,暹罗的大米出口量不大,主要来自于华人经营的手工碾米厂。1855年后,大米出口快速增长,手工作坊已不能满足市场

的需求,机器碾米厂蓬勃发展起来。由于华人在稻米收购、出口方面的优势地位及广东人在机械方面的才能,在与外国经营的碾米厂竞争中,华人企业逐步胜出,并在20世纪初形成垄断性优势。

此外,华人还积极向放贷业(20世纪初发展为银行业)、建筑业、锯木业、种植园业、包税业等行业进军。

其次,商业由外贸转向内贸。

暹罗在王室垄断贸易制度确立之后,逐渐重视利用华人。巴塞通王时(1629~1656)开始利用华人掌管对华贸易船,此后200余年间,华人一直主导着暹罗的进出口贸易。随着时间的发展,王室垄断贸易出现了诸多弊病,1824年拉玛三世宣布废除王室垄断贸易制度。1855年后,暹罗被迫对西方国家开放国内市场,华人彻底失去了在进出口行业的特权。此后几十年,在外国机船的激烈竞争下,中国帆船逐渐淡出暹罗的航运事业。

虽然,华人失去了在航运业方面的优势,但暹罗华商充分利用其在语言(一般二代华人都能熟练讲泰语和汉语)、市场知识及华商网络方面的优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们仍能在进出口贸易中占据优势地位。比如,1890年英国领事馆在曼谷进行的一次关税调查研究表明:中国人仍占暹罗进出口贸易额的62%^[119]。在西方商行的竞争压力下,一部分华商开始向中介业转化。同时,华人零售业也有了新的发展。随着暹罗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解体,华商零售网络也开始由城镇向农村扩展。华人零售商在农村定居以后,很快便和当地的华人中介商、批发商、钱庄合作,构建了一种新的商业网络。

再次,语系集团职业专门化和社会阶层的分化。

明代暹罗的华人以闽南商贩为主,清中期潮州人大批移居暹罗后,华人的职业和语系集团结构与社会经济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18世纪以后的暹罗,职业与语系集团的结合是相当紧密的。潮州人控制着暹罗大部分利润丰厚的贸易,包括大米和其他土特产、进口纺织品及西方食品。此外,绝大部分的包税人和碾米业主和几乎所有的当铺业主都是潮州人。福建人主要从事商业经营,尤其是控制着重要的茶叶贸易。同时,福建商人还涉足承包税收。由于在机械技术方面的优势,广东人主要是充当技师和工程师,经营铜铁店、机器

店,也有少数人经营碾米厂和锯木厂。他们还在丝绸业、建筑业、旅店和餐饮业中占有优势地位。客家人大都是小商人,特别是经营干果店的小商;小技工,包括银匠、皮革工人、裁缝;体力劳动者,小贩和理发匠。海南人的职业是:木匠、蔬菜种植者、渔民、佣人、服务员、茶馆老板、苦力、矿工和一些小贩。语系集团内部也存在着社会经济地位的显著差别。大部分的码头工人、运河和铁道工人和建筑工人是潮州人;暹罗南部的锡矿工人大多是福建人;广东劳工则在建筑贸易业中占优势^[20]。

造成语系集团职业专门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华人移出中国前的身份、所处的生活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移民到暹罗以后所要从事的职业。比如,明中期以后,福建人(主要是闽南人)之所以能在暹罗乃至整个南洋贸易中占主导地位,“所凭借的是闽南人无畏的冒险、航海、重商的人文精神和闽南偏远的地理位置……18世纪以后,广东尤其是潮州海商以澄海为基地发展海外贸易^[21],为潮州海商的兴起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早期到达暹罗的成功侨民对其晚到的乡邻所要从事的职业也有带动和影响作用。潮州华人对吞武里王朝的建立所做出的重大贡献,使他们在王室垄断贸易中处于优势地位,也为后来潮州华人在暹罗商业中的优势地位奠定了基础。福建人吴福星、吴万利父子及许泗漳家族在暹罗南部开采锡矿的巨大成就吸引了大批同乡,以致暹罗南部开采锡矿的华人多是福建人。此外,由于语系集团具有一定的封闭与排外性,一个语系集团的人很难进入其他语系集团的经营领域,因此同一语系集团的人一般固定从事几种传统的职业。

三、20世纪初华人社会的真正形成

从17世纪初到20世纪40年代,华人大规模地移居暹罗的历史已有300多年。尽管不少华人家庭已在暹罗居住数代乃至数十代,但就整体而言,在19世纪末以前,居住在东南亚的中国移民群体尚属流寓性质,没有构成真正的华人社会,其原因如下:

(一)通婚使华人同化于当地社会

由于中国封建政府、华人家族和传统观念的限制,很少有华人妇女移居海外。在19世纪末,英

国外交部《有关琼州贸易的外交及领事年表》所提供的数据表明:在1882~1892年间,中国移入暹罗的全部移民中,女性所占的比例不超过2%~3%^[22]。因此,流寓暹罗的华人或保持单身,或者选择与当地妇女通婚。加之暹罗与华南地区在宗教、生活习俗等方面相近,华人很容易与当地妇女通婚,融入当地社会,遂造成“华人流寓者始从本性,一再传亦亡矣”的局面^[23]。

(二)各移民社区和行业之间缺少联系

尽管中国移民散居于暹罗各地,并形成高度密集的定居点,还基于血缘、地缘、神缘、业缘成立了会馆、神庙和行业公会等,但由于语系集团和行业之间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各语系集团之间和定居社区之间都无稳定的联系,“他们客观上并未形成超越帮派的泛中国人组织与联系网络,主观上也基本上没有这方面的努力。”^[24]因此,在20世纪之前,真正意义上的暹罗华人社会还未形成。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清政府、保皇党人、革命党人的共同推动下,华侨民族主义在东南亚华埠兴起,迅速改变了东南亚华人社区的组织和结构,暹罗的华人社区也出现了一些重大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新式教育的发展

为了满足商业规模日益扩大和复杂的需要,也为宣传革命的理念,同盟会会员于1909年在曼谷创办了第一家新型学校——中华会馆华益学堂,而后又创办中华堂和同文学堂。之后,由各个会馆创办的学堂相继成立,对西方知识的传播和民主、民族主义的兴起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2、华文报纸的出现

暹罗的第一份华文报纸是由保皇会华人创办的《汉京日报》。1905年陈景华与著名侨商萧佛成、沈荇思共同创办了《美南日报》,次年改名为《湄南日报》。不久,《湄南日报》的股东、董事及编辑们由于政见不合,而分成革命与保皇两派。1907年,保皇派即在《湄南日报》的旧址,创办《信南日报》,由徐勤主笔。同年,革命党另组《华暹日报》,由萧佛成任社长,陈景行主笔。两报在1907~1911年间就政见问题进行了激烈论战,进一步促使了华侨民族主义的觉醒。

3、新型社团的成立

为了帮助从家乡来的新移民谋生,加强移民之间的交流,维持家乡特有的传统及帮助生活贫

困的同乡,在侨领的推动下,暹罗华社于19世纪末先后建立了一批华人会馆。这些会馆多是基于地缘、血缘、业缘而成立的纵向性组织,虽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华人之间的联系。随着华侨民族主义的兴起,华人社区和社团开始了一种横向的联合。天华医院和中华总商会的成立便是这种联合发展的结果。前者是五大语系集团共同创办的医院,为全体中国人服务;后者则是可以代表整个中国社会的组织。



▲泰国曼谷天华医院。(本刊资料)

4. 华人及其后裔认同的改变

晚清以前,中国民众一直没有“国际”概念,只知有家和家乡,不知有政府和国家。中华民族主义在暹罗兴起后,华人对家、家乡、共同神灵等的认同逐渐发展为对中国的认同,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为对国家政治的认同。

伴随着这些事情的发生,我们可以说,20世纪初,暹罗出现了一个真正的华人社会。因为,“这个社会已有了自己的报纸——不分语系集团都可以阅读,并且都致力于同革命事业的报纸。这个社会已有了一个福利机构,所有五个语系集团切实合作支持它的活动。最重要的是,在中华总商会理事的人物中,有受人尊敬的社会领袖,他们能代表整个中国人社会讲话。”^[12]

四、结语

从17世纪开始,随着大批华人源源不断地到来,暹罗华人的活动空间不断地扩大,所从事的行业不断地扩展,各定居点和行业之间的联系也日益密切,至20世纪初最终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华人社会。暹罗华人社会的形成可以说是中暹两国社

会、经济、文化长期交流发展的结果。由于暹罗长期执行优待和重用华人的政策,华人团体可以相对正常地在暹罗成长,又基于各种历史因缘,重新组合、改造、教化,终于形成了保持一定独立性的华人社会。另一方面,暹罗华人社会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社会。华人在暹罗的社会活动和生产活动都是以整个暹罗社会为基础的。华人在暹罗落地生根,和泰族通婚融合,相互取长补短,在暹罗的政治、经济、文化、司法、外交等多个领域作了重大贡献,积极地推动了中暹友好关系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23]黄衷. 海语(卷1)[M]. 北京:中华书局,1991:1,2.
- [2]施坚雅. 古代的暹罗华侨[J]. 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62(2).
- [3][4]张燮. 东西洋考[M]. 北京:中华书局,2000:59,57.
- [5][6][7][12]史金纳. 泰国华侨社会,史的分析[J]. 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62,(2).
- [8][14]钟福安. 泰国华人社会的形成论述[D]. 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1998:12,24.
- [9]陈伦炯. 海国闻见录[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51.
- [10]棠花. 泰国古今史[M]. 曼谷:泰威信印刷有限公司,1982:38.
- [11]杜宾. 暹罗王国史[M]. 曼谷:美国教会出版社,1908:161.
- [13]思源. 三聘华人社区的形成[M]. 泰京三聘联谊会会刊,1986,(3).
- [15][16][17]史金纳. 泰国华侨社会,史的分析[J]. 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64,(1).
- [18]沙拉信·威腊蓬. 清代中暹贸易的演变[M]. 哈佛:哈佛大学出版社,1977:171.
- [19]史金纳. 泰国华侨社会,史的分析[J]. 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64,(2).
- [20][22][25]史金纳. 泰国华侨社会,史的分析[J]. 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64,(3).
- [21]庄国土. 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M]. 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104.
- [24]庄国土. 论东南亚华族[J]. 世界民族,2003,(3).